

解放軍軍史碑



红军史

[1927—1937]
下卷

郭德宏

阎景堂○主编

版
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解放軍軍史

★ 红军史 [1927—1937]

郭德宏 阎景堂 ○ 主编
下卷

张 青岛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一 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坚持打阵地战、正规战,前线战事节节失利,广昌、建宁等地相继失守,瑞金、宁都也频频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引敌军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派遣红军第7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第6军团进行西征。

(一) 红7军团的北上与失败

红7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比较新的一支部队,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由于连续作战,红7军团人员和武器损耗都比较大,全军团约有4000人,经过突击补充才达到6000余人,长短枪也仅有二三百支。7月初,接到中央命令后,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人率部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瑞金待命。在瑞金,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人,要求部队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动,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斗争。



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



红7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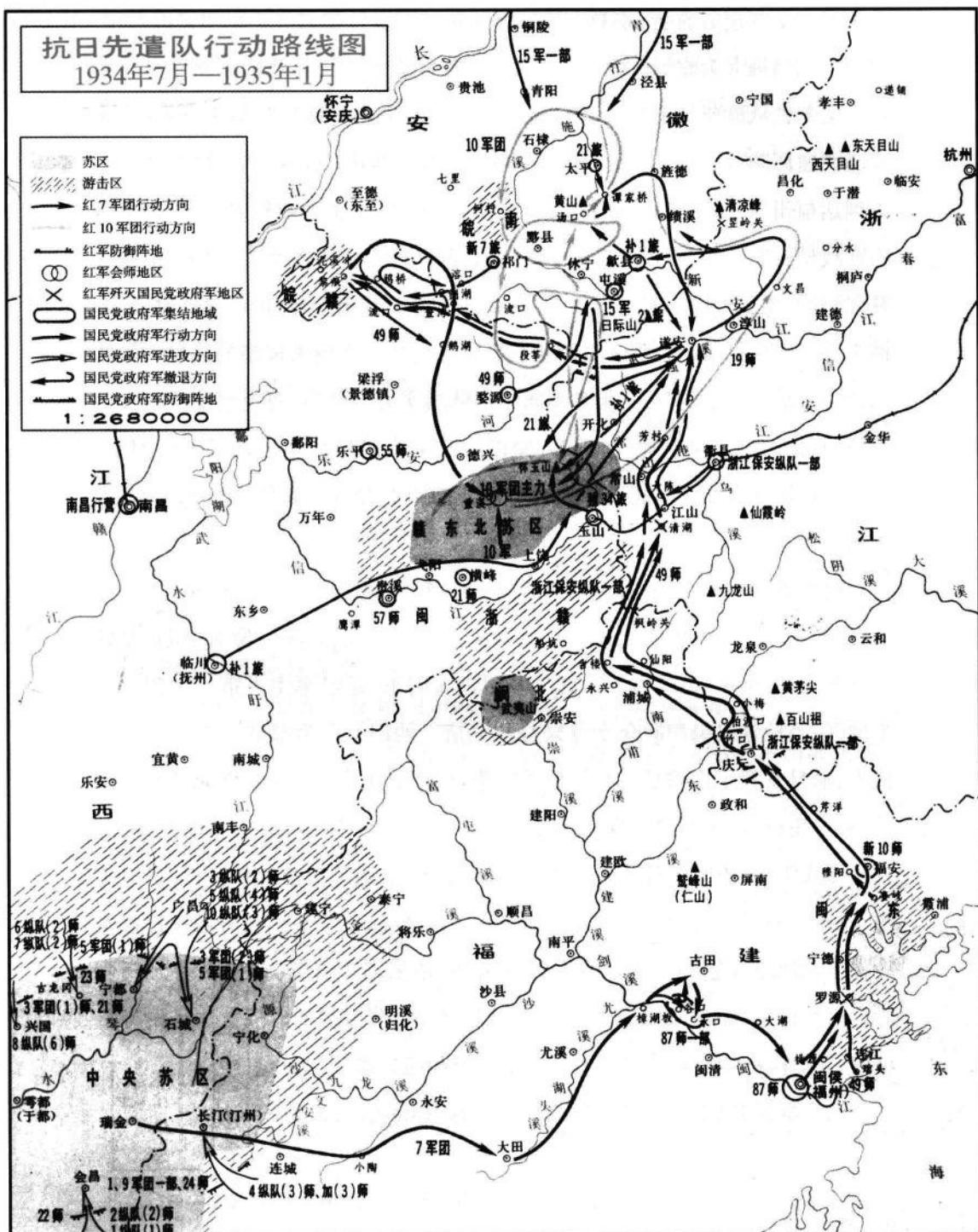
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中共中央还决定派遣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规定：“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与军团长、政委三人组织七军团的军委，中央代表领导党的工作、反日运动和游击战争，并与地方秘密党的组织取得联系。”^①同时，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 160 多万份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北上抗日主张。

经过紧张准备，7月6日晚，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星夜兼程开始向闽中方进。7月下旬，红7军团相继攻陷大田、尤溪口、樟湖板以及闽江北岸的黄田和谷口等地。为了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回援，缓解中央苏区东线的军事压力，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7军团主力在攻占谷口后，突然转变方向，向水口、福州进军。8月1日，红7军团占领水口。在同日召开的“八一”纪念大会上，红7军团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2日，红7军团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

^①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 5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是敌人在闽浙地区的军事重镇。红7军团逼近福州,使国民党当局大为吃惊。为了保住福州,负责进攻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忙从漳州飞抵福州,驻扎在闽东宁德、福安等地的敌第87师主力也奉命急速回防,从而大大增加了红7军团攻城的难度。8月7日,红7军团主力到达福州西北郊,当晚开始攻城。由于福州城防本来就比较坚固,再加上城内守敌早有准备,因此攻城进度十分缓慢,部队伤亡也比较大。9日晚,部队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经过1天1夜的猛攻,10日傍晚,当敌援军逼近时,红军撤出战斗。攻打福州是红7军团北上后所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虽然此役给予敌人一定的打击,但却暴露了部队的实力,同时自身也遭受了很大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给以后红7军团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当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北上部队的实力并不强时,便开始疯狂追击和堵截红7军团。

桃源战斗后,红7军团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8月中旬到达位于宁德、福安、霞浦3县之间的闽东游击区。这一游击区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红7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第一次到达这个地区,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不仅为部队补充了一批新战士,而且安置了伤病员。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8月14日凌晨,红7军团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以很小的代价攻克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第11团第3营及警备队共1000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狠狠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罗源战斗,红7军团没有像攻打福州时那样采取正规战那样猛打硬拼的打法,而是采用了奇袭方法,结果大获全胜。这使许多指战员意识到,在敌后采用正规战、阵地战的作战方法是没有出路的,“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①

攻克罗源县城后,红7军团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

^①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方向前进。8月22日,红7军团在闽东独立团和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克福安县的穆阳镇,歼敌数百人,筹得现洋3万余元。28日,红7军团攻克庆元县城。30日,红7军团在竹口击溃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200余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10余挺、迫击炮两门。连续打了3个胜仗后,红7军团声威大震。

9月3日,红7军团进入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游击区。由于连续行军和作战,部队原本想在这里作短暂休整,然后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评。无奈之下,部队只在闽北苏区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不得不继续北上。12日,红7军团进入浙江江山。13日,红7军团消灭浙江保安团1个营,攻占清湖镇。15日,红7军团在大陈打退浙江保安纵队第3、4、6团各一部共7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当敌人援军向常山反扑时,红军主动撤离。16日,红7军团渡过常山港后,进到芳村。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红7军团,命令部队在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之前,禁止继续北上。18日,中革军委又来电,要求部队以遂安为中心,在浙皖边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7军团离开芳村,向遂安开进,20日到达上方镇。正当部队继续按计划前进时,国民党军队第49师和浙江保安第1、2纵队以及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1旅尾追而来,准备合击红7军团。形势万分紧急,为了避免全军覆灭,红7军团决定放弃以遂安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转而向皖赣边前进,30日到达皖赣边的段莘、黎痕地区。

皖赣边接近红7军团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并且这里大山纵横,河道交错,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红7军团决定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10月中上旬,红军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缴获了一批武器。接连几次胜仗,使根据地的群众备受鼓舞,不仅在物资上支援红军,而且还先后有500多人参加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红7军团摆脱了困境。然



而,就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7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根据中央命令,红7军团艰苦转战,通过两道封锁线,于11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老苏区,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红10军是牵制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央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曾经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7军团的到来,增强了闽浙赣苏区的力量。方志敏和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他们,用尽可能筹集到的物资来慰劳他们。这使得广大红军战士的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为了整合闽浙赣苏区的武装力量,11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将红7军团同红10军合编为红军第10军团,红7军团改编为第19师,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20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19师师长,聂洪钧任政治委员,刘英任政治部主任;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10军团参谋长)。关于红10军团成立后的任务,电令规定:“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于中央红军主力已离开苏区开始长征,所以电令中还特别指出:“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即项英)指挥,省委亦受中区分局领导。”^①

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的要求,11月18日,寻淮洲率领第19师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设置在玉山至开化之间的封锁线,长驱直入,向浙皖赣边挺进。红19师一路击退浙江保安纵队的围追堵截,直逼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杭州。随后,红19师又转向皖南行动,进入安徽歙县,攻克旌德,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红19师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卓有成效,有力地打击和

^①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新的红十军团给项英、方志敏等的指示》,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76页。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牵制了浙皖赣边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使敌人防不胜防。然而，就在此时，以项英为代表的中央军区发来指示，要求红10军团的3个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同时决定，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10军团行动。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军区不着手开展游击战，反而时刻想着进行大兵团作战，企图打大仗，这种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为红10军团之后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根据中央军区指示，方志敏和刘畴西率领红10军团部和第20、21师于11月下旬离开闽浙赣老苏区，北上皖南，12月10日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洲领导的第19师会合。红10军团的3个师会合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便沿着屯溪至青阳的公路继续北上。

12月13日，部队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太平县谭家桥地区。这时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尾追红军的敌补充第1旅孤军突入，已经抵达汤口。鉴于其他敌军距离尚远，红10军团首长决心集中兵力，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并歼灭该敌。14日上午，敌补充第1旅前卫第2团及旅直属队刚进入乌泥关设伏地区后，红军突然向其实施猛烈攻击。敌军顿时惊惶失措、乱作一团，敌第2团团长也在混乱中被红军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还是有利于红军的。但是，由于红军过早暴露火力，再加上谭家桥地区的制高点很快被敌军占据，因此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19师师长寻淮洲奋不顾身，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带领部队强攻。经过勇猛冲杀，制高点是夺回来了，但是寻淮洲却身负重伤，不久即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不久，敌人的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在这种情况下，红10军团被迫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谭家桥之战是红10军团主力会合后的第一次战斗。初战失利，特别是红19师师长寻淮洲牺牲以及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干部负伤，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受到严重影响。红10军团在战略上愈加陷入被动。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军队第49师、补充第1旅和第21旅以及一些地



方部队一共约 20 个团的兵力,分 3 路进行追堵。为了摆脱追敌,自 12 月下旬起,红 10 军团开始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青阳、石埭、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 10 余县地区与敌人周旋,先后进行了大小 10 余次战斗。这些战斗虽然使敌人伤亡惨重,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自身伤亡也不少,部队减员达 1/3 以上。在这种形势下,红 10 军团领导决定率领全军团经化(开化)婺(源)德(兴)返回闽浙赣苏区。



1934年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师,组成红10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方志敏于翌年1月不幸被俘,8月6日在南昌就义。红10军团余部由粟裕、刘英率领转战浙南。图为方志敏在狱中。

1935 年 1 月 12 日,红 10 军团到达浙江开化县德杨林。15 日,主力部队进入(开)化婺(源)德(兴)苏区。16 日夜,粟裕、乐少华、刘英等率领先头部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地区。主力部队原本也要在当夜通过封锁线,但是军团长刘畴西顾虑部队疲劳,天气又十分恶劣,便就地休息了一夜。省苏维埃主席兼任军区司令员方志敏考虑到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就在红 10 军团的主力部队第二天准备突围时,遭遇到敌人的重兵包围和封锁。尽管广大红军战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拼命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

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人员从怀玉山突围到闽浙赣苏区。1 月 27 日,军团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等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不幸被捕。此后,他们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不忘革命目标和自己的信仰,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 20 余万字的文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在经历了严酷的折磨之后,当年 8 月 6 日,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市城北下沙窝刑场被敌人“秘密处死”,英勇就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 7 军团的北上和红 10 军团的突围虽然都相继失败了,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不畏艰苦、英勇战斗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转战闽浙皖赣地区,所到之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撒下革命的火种,有力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与此同时,已经突围的红 10 军团先头部队也与地方部队组成挺进师,由师长粟裕和政治委员刘英率领,在闽浙边地区坚持了 3 年游击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挺进师编为新四军一部。

(二) 红 6 军团的西征

1934 年,随着中央苏区形势的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派遣红 7 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牵制敌军外,还于 7 月 23 日给红 6 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要求“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从而在湘中地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同时,要求红 6 军团“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为了保证红 6 军团顺利西征,决定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与萧克、王震组成红 6 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席。^①

^①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 12—15 页。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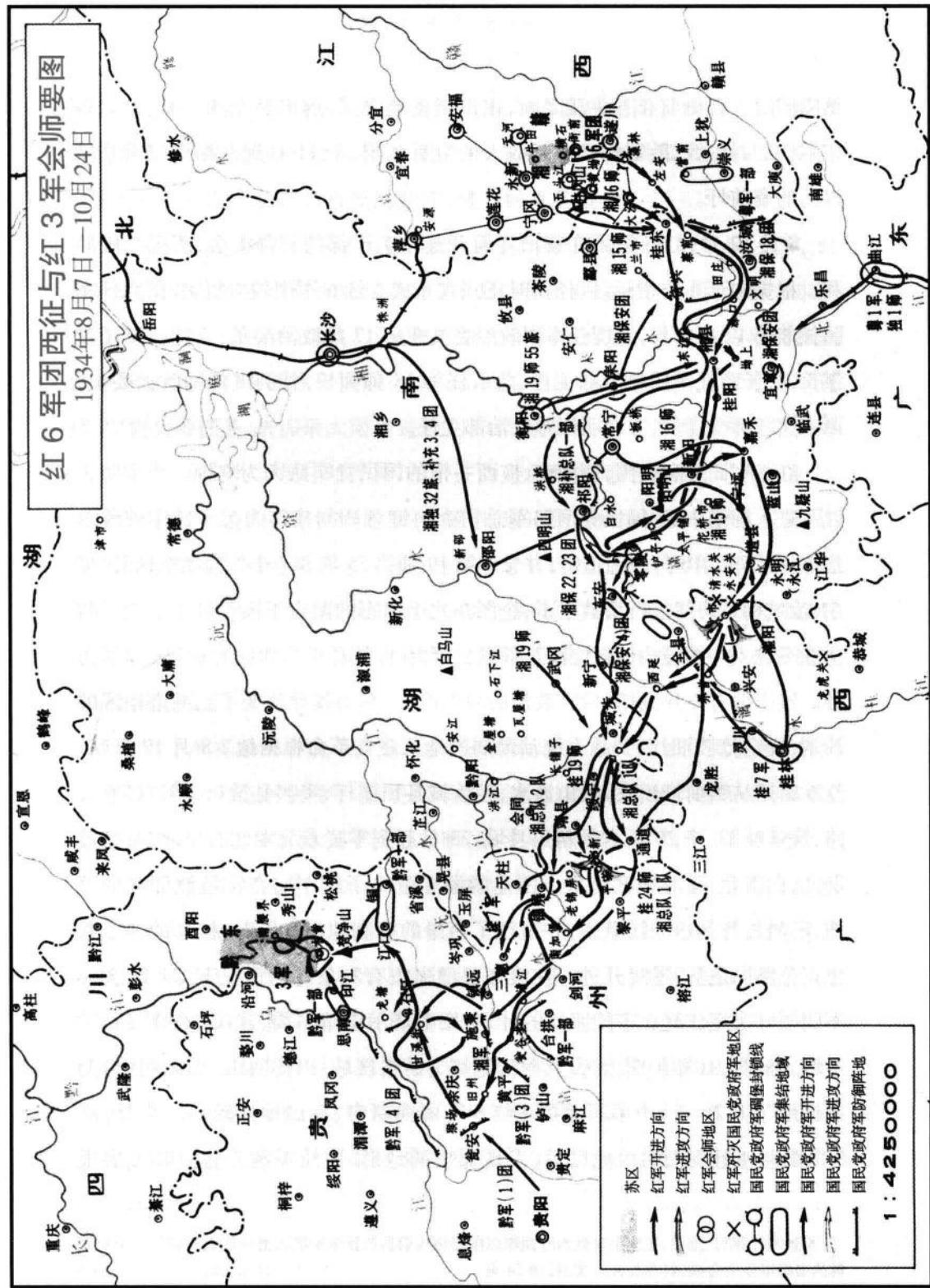
红6军团政治委员王震

红6军团成立于1933年6月，由红17、18师组成，主要在湘赣苏区活动。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后，红6军团积极为转移做准备。首先，任弼时做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形势，传达任务，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整补充主力部队，部署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筹集草鞋、干粮和弹药，并调集数百名地方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做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及扩大红军和筹粮筹款工作。为了迷惑和牵制敌军，还于8月初以独立第5团一部伪装成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万安一带佯动。

鉴于准备工作已经比较充分，再加上敌情发生了变化，军团经请示中革军委，决定提前行动。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告别曾经共同战斗生活过的湘赣苏区人民，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域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为了不过早暴露红军的行动企图，突围点选在粤军和湘军的接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地段，这里敌人兵力薄弱，易于攻破。军团侦察连和先头部队1个排伪装成国民党军，为先头部队开道，下午3点左右出发，大约在晚上10时走到有近千人的两个保安团防守的上葆林，顺利地收缴了敌人哨兵的枪支，使部队一举消灭了这两个保安团。接着，部队又日夜兼程，连

红6军团西征与红3军会师要图

1934年8月7日—10月24日





续突破敌人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遂川至黄坳之间、遂川至七岭之间、寒口到广东桥的封锁线，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于 11 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8月12日，红6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师参谋长，方礼明任师政治部主任。

红6军团胜利突围，使湖南、广西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大为吃惊。为了防止红军进入湖南中部，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调刘建绪为第4路军前线总指挥，令第15、16师跟踪追击，并急调第19师第55旅和4个保安团在郴县、桂东、汝城构筑防线进行堵截拦击，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为了阻止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也率领两个师向北调动，加强防务。鉴于前有重兵围堵，后有数倍的敌人追击，军团领导改变了到湘南地区的计划，决定抢渡湘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8月12日晚，红6军团从寨前圩出发，跋山涉水，经汝城县田庄圩、资兴县滁口，越过郴宜公路，绕道桂阳，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23日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滁浦地区前进。围追的湘军看出了红军要在零陵渡湘江的意图，已经先行到达湘江沿岸，并占领了西岸的有利地形。同时，桂军的两个师也正分路向道县、零陵开进。在渡江已经失去有利条件的情况下，24日，红6军团领导决定放弃在零陵渡江的计划，发电请示中革军委，建议“在祁、新、常地域之杨明山（即阳明山）及其附近地域为游击区域，以杨明山（即阳明山）为根据地”。^① 26日，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向新宁、巫山地区转移。当日，红6军团急速赶到阳明山地区后，发现那里的地形、民情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

^① 《任弼时、萧克、王震关于红六军团拟以阳明山为根据地致朱德电》，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24页。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据地，便向东北进入白果市，从而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红6军团急转南下，星夜兼程，经过嘉禾、永安关、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于9月4日上午在广西全县的界首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县城。

9月8日，中革军委给红6军团下达补充训令，要求部队向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进军，指出：“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为了保证行军速度，完成会师任务，进而最大限度地吸引和牵制敌军，中革军委还对行军路线以及今后的任务作了规定和部署，指出：“为避免渡大河的障碍与不利的战斗，应规定沿湘、贵边的前进路线如下：即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这是九月二十日后的任务。在第三阶段中，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①

接到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后，红6军团即于当日由西延车田出发，向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挺进。鉴于行军途中遭敌袭击，再加上靖绥以北地区有敌重兵围堵，红6军团领导当机立断，改变原来计划，夺路南下，袭取通道县城，过渠水，向西通过锦屏、黎平，强渡清水河、大沙河，于10月4日到达瓮安县猴场。这天，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停止西移，指出桂军正向南开动，红2军团已占印江，红6军团应迅速向江口前进。遵照军委命令，部队5日从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6日进至石阡县的走马坪、廖家腾地区，7日上午到达甘溪镇。部队正在这里休息时，与桂军第19师遭遇，并陷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红6军团由于对4日军委电报中关于桂军南移的消息深信不疑，对敌军的到来缺乏警惕和准备，再加上这一地区山高沟深，处

^① 《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今后行动的补充训令》，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34—35页。